

阮元实学思想丛论

彭 林

Concentrating on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matter-of-fact attitude," "focus on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comprehensive study of western cultures" and "give the nation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and resist foreign bu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Ruan Yuan'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real learning and to the academic studie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明清之际，风云变幻，国内民族矛盾与中西冲突相继而起，家国之难，日甚一日，儒林上下，士气激变，天下大事，莫非己任。读有用之书，为社会尽责，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点的实学思潮遂勃然而兴。

阮元是乾嘉时期学界山斗，曾编撰《经籍纂诂》、《畴人传》，编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主持风会数十年”^①；同时又是有清一代名臣，乾、嘉、道三朝元老，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他一身而二任，均有建树，是乾嘉学人典型之一。阮元为政为学，是否贯穿实学精神，涉及到对乾嘉学派的基本认识，故试作探讨。

务求其实 惟从其是

开清代学术先河者为顾炎武。顾氏痛诋明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之学，以实事求是为宗，从而确立了清代实学的底蕴。顾氏以儒家“六经”为圣人经国之作，是“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②。经书不是敲门砖，读书不为求利禄。学者之责，在于究明圣人之道，淑世救民，即所谓“通经致用”，此为务之急，因此，“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他提倡以溯古为通经之途，反对凿空以求之，主张以“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

所以救世。”^④乾嘉学术正是以通经和溯古为基本特点而加以扩展的。

戴震踵继顾炎武，将顾氏的实学思想加以推阐：“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⑤他张大顾氏之说，认为溯古通经之途，音韵之外，还有天文、地理、律算、名物等各个分野，“儒者不宜忽置不讲”，^⑥他说：“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⑦显示了他严谨、求真的学术境界。

阮元完全继承了顾、戴的实学思想，其视野所及几乎遍于乾嘉学人所有领域，而皆归宗于经旨。他以“鞏经”为室名，正是一生治学旨趣之总括。阮元治经，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宗旨：“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⑧通经之途在于稽古，而稽古之成败，在于能否得古人训诂、义例之真。因此，阮元治经，尤重训诂，他说：“训诂错则言语错，执古圣之书，以小辨破其言而断断论之，道义皆错矣。使古圣人见后人如此错解之也，必哑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尔雅》之学，则《五经》、《四书》皆鼠璞矣。”^⑨他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⑩为求经书之真，必须探求古

人义例，“稽古之学，必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⑩这与顾、戴之道是一脉相承的。

经学渊源在两汉，以许慎、郑玄为代表的汉代学者最近于古，所论更近于真，阮元对他们的推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他说：“两汉学行醇实，尚近于春秋列国之时”，^⑪“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⑫但是阮元并无佞汉之气，以为许、郑之言字字珠玑，不可移易。相反，只要证据确凿，即可驳正。阮著《考工记车制图解》，所论即颇有与郑玄违拗之处，如《考工记》云：“国马之轡，深四尺有七寸。”郑注：“衡高八尺七寸，除马之高则余七寸，为衡颈间也。”《考工记》又云：“轡前十尺而策半之。”郑注：“谓轡帆以前之长也。”郑玄说轡深指端下垂至帆之高，如此则轡前端之衡不在马颈之上，而在马脊之中，大悖情理。而且，郑玄以马高为八尺，此与《汉书》所记马的标准高度为五尺九寸不符。阮元根据《考工记》其余各处“深”字的字义，解此“深”为轡的弧度的弦高，使文从字顺，而且与武梁祠汉画像石所见马车之形制相符，故阮元斥郑玄对轡制的说解“一往皆谬”。如此之类，恕不备举。焦循的《群经宫室图》“其书往往异于先儒之旧”，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的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对此，阮元主张宁从其是，不屈从其人，“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⑬重汉儒而不为汉儒所囿，正是阮氏求实精神的体现。

学术既为求真，则不可为一孔之见所蔽，必须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宋儒擅长义理，清人精于考据，后成两大阵营，势成水火，相为攻伐。阮元虽出于乾嘉考据阵营，但并不鄙弃义理之学，认为两者不应偏废，“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⑭他钦佩顾炎武“精力过人，志趣远大，

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⑮可见他并非株守考据之学，向慕章句之儒，而以治学有学术、有经世之具为最高境界。惟其如此，他在撰《儒林正传》、《附传》时，能“持汉学、宋学之平”，^⑯体现了他平实求真的学风。

阮元最重经学，而经籍简奥，讹脱衍倒、乃至前后抵触之处也在在多有。因此，欲求经学之真，必须借助其它史料，以为攻错之资。金石学肇端于北宋，元明衰微，入清后，因乾隆年间编撰《西清古鉴》等书，再次勃兴。但学者间对于金石作用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大多把它作为书斋把玩之物，或者以之附庸风雅而已。阮元则将铜器、石刻、玺印等传世文物作为正经补史的珍贵史料对待，他说：“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篆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⑰当时的传世铜器，有长铭大篇的，如毛公鼎铭近五百字，阮元认为其价值不在西晋出土的汲冢古书之下，于经史研究大有裨益，“古器铭字多者或至数百字，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甚远。”他认为，器铭研究对于文字学也有重要意义，“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⑱因此，他所到之处，积极收集器物及拓本，然后裒集成册，以广流传。乾嘉时期收集铜器、石刻及拓本的学者极多，而以阮元所得为最富。曾列举十事，作为自己热心于金石的得意之举^⑲，此略举数例。山东为鲁、齐、曹、宋旧地，三代文物，富甲天下，可据以定经本之正讹，断史志之是非。若能搜罗汇辑，则沾溉学林，功在千秋。乾隆年间，阮元在山东任学政，遂案诸志乘图籍，逐一访求金石拓本，为此而历尽艰辛，“或舂粮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椎脱，捆载以归”^⑳，共得拓本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几有囊括殆尽之感。其后，阮元移任两浙学政，又裒集所得金石千余种，勒为《两浙金石志》。嘉庆初，阮元所编《积古斋钟鼎款式》十卷成，计商器 173 件、周器 273 件、秦器 5 件、汉晋器 99 件，共 550 件，蔚为大观。每器之

后均有拓本或摹本，下有释文及结合经史所作的考证。此书仿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体例，而所收器物远远多于薛书。书首有阮元所作《商周铜器说》，论述铜器铭文的学术价值及铜器出土情况等。在清代著录和考释金文的著述中，此书不仅成书早、收录器物多，而且内容也较好，在金石史上有重要地位。又，汉《西岳华山庙碑》明代已毁，海内流传的拓本只有四明本、长垣本和山史本三种，藏家视为奇宝，秘不示人。四明本有篆额，但残缺约百字。长垣本为剪裱本，篆额已无，而四明本所缺百字俱在。嘉庆十三年，阮元得四明本，此本单纸全碑整拓，未剪未裱，篆额左有唐人李德裕题名，此为长垣、山史本所无。李德裕曾两度到碑下，与《新唐书》、《旧唐书》及《嘉定镇江志》所引《卫公年谱》、《卫公献替记》相合，故而弥足珍贵。因拓本纸力已敝，次年，阮元将此本摹刻后，置北湖祠塾。其后，阮元又借得长垣本，用双钩摹补所缺百字，使成足本，研究价值顿升。阮元还藏有古人名印数百钮，见于史书者，自汉至唐得二十八钮，如秦嘉、李广、刘胜、王匡、窦武、刘渊等，皆据文献逐一考订，相互印证。阮元生时，近代考古学尚未在中国诞生，故不能得见科学发掘之地下资料，但是，他用传世文物与文献互证的方法，不仅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提高了经学研究的水平，而且遥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端，其识见不可低估。

为了求得对经典的确解，阮元还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如《尚书·禹贡》详载上古地理状况，而时移势易，几多变迁，古今地名已多不能对应，故殊难通读。如《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正义》引郑云“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东入海。”长江从岷山发源，至下游分为北江、中江、南江三江，流入大海。三江究竟何指？浙江与《汉书》、《说文》、《水经》所说之浙江是否为一？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经典释文》引韦昭云，三江谓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或云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阮元任浙江学政时，屡屡往返于杭州与家乡扬州之间，于水道多所考察，“七八年来，博稽古籍，亲履今地，引证诸说”，^②曾亲自察看浙江境内诸水道流

向，及河流入海口的沙质，以判断是否为古河道淤积所致。后作《浙江图考》三卷，考定北江经江宁、镇江、丹徒之北入海，即今之长江；中江为由高淳过五坝，经宜兴入海者，自杨行密筑五堰，其流断绝；南江即由池州过宁国府，会太湖，过吴江，出仁和西南，由余姚北入海者，此江最早为长江之正流，唐初筑海塘挡潮，其流也断绝。南江即今钱塘江，本名渐江水。浙水与渐水非一，唐以后不能区别，遂以渐江为浙江。此文为阮元注重实证的代表作之一。阮氏考证三江，显然与他长年负责漕运、海塘等事务密切相关，非徒为发思古之幽情。阮氏治绩卓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力于他对典籍的精到研究。

会通中西 志在中学

万历年间，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也肇端于此。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历算之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历朝历代都极重视改历颁朔，但此学至明代已式微，不敷日用。传教士通过对日食的精确预报，屡屡挫败钦天监官员，使朝野震惊。面对理论体系与观测手段迥异于中学的西洋天文学，学者多向两极分化，一派为守旧派，“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③；另一派为西化派，动辄“诋古法为粗疏不足道”^④。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中国传统学术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实学学者苦苦思索的重大课题。

许多实学学者顺应时势，将目光投向久已生疏的历算之学，发奋攻读。时隔不久，即硕学辈出，王锡阐、薛凤祚、梅文鼎、惠士奇、江水、戴震、焦循、钱大昕等，皆一时之选。阮元没有盲目排外，而是追随时潮，精研对社会发展有用的西方科学，“尝稽考算氏之遗文，泛览欧逻之述职，”于“中西异同，今古沿革，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无不“旁稽载籍，博问通人”^⑤，于此道造诣尤深。阮元对西人先进的天文仪器也给予很高评价，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望远镜中望月歌》中，描述了他用“五尺窥天筒”观察月球时的欣喜之情，他在“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句下自注云：“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万余里。”由此可见阮

元面对现实, 欢迎并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积极态度。龚自珍曾称赞阮元“仰能窥天步, 俯能测海镜, 艺能善鞞弹, 聪能审律吕”^④, 绝非过誉。

但是, 西学东传, 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罗马教廷的“学术传教”策略, 与殖民者的炮舰鸦片相辅相成, 都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而不是帮助中国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学者不得不在边疆和海防屡屡受到西人侵犯的氛围中学习西学。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是有选择、有保留的。他们肆意贬低中国历算之学, 不适当地夸大西方天文学的水平, 企图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尊^⑤。因此, 阮元与许多学者一样, 不得不从捍卫国家尊严的角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在阮元看来, 正确认识本国固有的本位文化, 是涉及到能否建立民族自信心的重大问题。为此, 阮元编撰了《畴人传》, 意在为中国历算之学建史。此书第一次将古代史志中有关历算的资料荟萃一书, 钩沉发微, 使古代历算学的伟大成就再现于世。阮元希望学者能进而对中西之学作深入比较。

阮元反对守旧派和西化派各执一端的偏激立场, 他赞同焦循“会通两家之长, 不主一偏之见”的态度^⑥, 主张利用西学之长来建立新的中国本位文化。他在《畴人传》中收入西洋天文、数学家四十一人, 辑为四卷, 这显然是要使读者都能了解西学之长。阮元在学海堂对学生所提的问题, 不少涉及到中西历算比较研究, 如“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 所由何路?”“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 但孰先孰后? 孰密孰疏? 其创始造历, 由今上溯若干年? 准中国之何代何年?”“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海舶而来?”等等, 表明他所要培养的后学必须学贯能兼通中西。

但是, 阮元并不盲目崇拜西学, 对传教士蓄意歪曲中西算学史的言论, 则必定在摆明史实的基础上明辨之。他的这一思想, 也充分体现在学海堂的策问中, 如:“西法言依巴谷在汉武帝、周显王时, 确否?”“唐时市舶与西洋各国往来更熟, 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 何以不来于唐《九执法》之前?《九执法》又自何来?”“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为东来法也?”传教士宣称, 西方天文

学早在中国西汉时就已发达如今。阮元驳斥道, 达摩在六朝时就已到中国, 证明当时海外交通已开。“汉鄱萌已有诸曜不附天之说, 后秦姜岌已有游气之论, 宋何承天立强弱二率, 齐祖冲之岁差等法, 皆比汉为密, 与明来之《大西洋新法》相合, 是皆在达摩未入中国前也”。证明当时的西学水平与西汉相当, 双方距离的拉开, 是在明代。启发后生小子当知自强, 而不要实行文化自戕。

阮元非常注重对文献所记传统天文学体系的重构和所含古代科学因素的发掘。中国历算之学发达颇早, 只因后儒轻视而多失传。阮元研究传统天文学体系的代表作是《御试拟张衡天象赋》, 而研究古籍所含古代科学因素的代表作则是《自鸣钟说》。张衡是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 精于历算, 著有《灵宪》、《算罔论》, 阐述浑天说; 又擅长机械制作, 所作浑天仪、候风地动仪, 极负盛名。候风地动仪为世界最早的测候地动的机械装置。阮元在《御试拟张衡天象赋》中描述了张衡的浑天说, “惟圆象之昭回, 建北极以环拱; 拟磨旋以西行, 俨笠冒而中拥。”“分五官以各正, 围列宿而高耸。”又叙述日星度数:“原夫日周天步, 月丽天衢。日一度而若退, 月十三度而愈纡。分十二以合朔, 乃会躔以同符。冬起牵牛之次, 夏极东井之区, 秋遇寿星之位, 春在降娄之隅。”以下又记十二纪、五行星、四仲中星等, 极尽详备。此文的文体为赋, 对仗工整, 韵脚齐整, 读之琅琅上口, 最便传颂。在《自鸣钟说》一文中, 阮元剖析自鸣钟之构造, 仔细观察报时系统中发条与第二塔轮、第三中心轮、第四直轮及第五齿轮之间的制动关系, 以及击钟系统中发条与第二塔轮、第三击轮、第四鸟头轮、第五小轮及第六风轮之间的制动关系, 认为其原理是用轮和螺来表现的重学理论:“西洋之制器也, 其精者曰重学。重学者, 以重轻为学术, 凡奇器皆出乎此。”阮元认为, 重学与中国古代的刻漏原理相同, 《小学紺珠》中提及的宋以前的自动报时装置“鞞弹”, 与西洋的自鸣钟类似, 可惜与候风地动仪一样久已失传。阮元希望国人充分了解本国科技史实, 自尊自强, 重振国学。

数学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 故阮元又大力提倡数学, “六书九数, 先王并重。”^⑦“盖深明乎九数之正负比例, 六书之假借转注, 而后

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义，豁然大明于数千年之后。”^⑧“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他指出刘歆、郑玄、贾逵、何休、韦昭、杜预等都精通算学，他对明儒鄙薄艺事、不务实学的恶劣作风深恶痛绝，“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间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测圆者不知天元，习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谬误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几乎息矣。”^⑨阮元不仅提倡数学，而且身体力行。阮元曾主管八省漕运，每年过淮粮船达五千艘之多，运量极大。旧用“三乘四因法”，烦琐不便，统计亦不精确。阮元将立方之体积化解为标尺，“较旧法捷省一半，简便易晓”。^⑩又，黄河挟泥沙入海，经年日久，海口之沙愈积愈多，愈垫愈远，竟达数百里。阮元以勾股弦定理说明并计算之。^⑪

阮元认识到，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就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学贯中西而知所自立的青年才俊。为此，他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又在广州建立学海堂，取士不用八比文、八韵诗，也不用扁试糊名之法，而是以书传条对，了解其识见。所开课程，除经史、小学之外，尚有天部、地理、算法等，“不十年间……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⑫

国体为大 抵御外侮

清代前期，海衅日滋。先有安南海寇流窜于浙、闽，后有英夷以鸦片、炮舰为虐广东。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阮元是在林则徐之前，最早主张抵御外侮、禁绝鸦片、捍卫国家尊严的官员之一，体现了实学学者心系国家命运、勇当国难的境界。

阮元曾连年在浙江指挥平定安南海寇的战争。“我向东瓯催战舰，封关那用一丸泥。”^⑬表达了阮元杀敌报国的急切心情。嘉庆五年庚申（1800）六月，于台州破安南寇船，获其四总兵印，销之为剑，而有“销熔夷寇印，仿铸古吴钩”^⑭之句，又有“海上如连万里城”、

“看尔长鲸就戮时”之句，其征战豪气，跃然纸上。总体而言，阮元指挥的平定安南海寇的战争进行得较为顺利，而抵御英夷的斗争却要艰巨、复杂百倍。

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中国沿海，以欺诈与胁迫相加，力图打开中国市场。此后，英国政府多次派使节来华，要求增开商埠，降低关税，开设银行，划给租界。嘉庆十二年（1808），英军登陆，强占澳门，图谋向内陆扩张。嘉庆十三、四年间，洋盗在粤东与烂崽相勾结，深入内河肆虐，以至在广州即可闻其炮声。二十一年（1816），英王又派阿美士德来华谈判，为清政府所拒绝。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二十八日，阮元奉旨调补两广总督，自此至道光六年（1826）的九年中，阮元以两广总督、两广盐政兼摄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等职，总揽军政。如何对付殖民者，成为阮元为政的首要之务。

清廷内部，对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主战、主和之争；对于鸦片走私，有严禁、弛禁之别。阮元属于主战和严禁之列。认为殖民者的本性是“恃强桀骜，性复贪利，”不可对其存有幻想，与之交往的基本态度应是“宜多镇以威，未便全绥以德”，倘若其不知收敛，胆敢“擅入内洋，即随机应变，加以惩创，一则停止贸易，一则断其食用买办，一则开炮火攻。”他认为，殖民者虽有所强，但不无弱处，“彼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不同。”^⑮因此，不必盲目恐惧，避实击虚即可。可谓知己知彼。

有见于此，阮元到任后，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打击不法洋商和英商，二是加强军事防御。洋商与英商利益相诱，故洋商百般庇护英商，英商则有恃无恐，彼此沆瀣一气。阮元到广州之初，即发生两起纠纷，阮元都果决处置。先是英国商船在黄埔取水，与中国居民发生争执，英人用鸟枪打死居民数人。阮元严饬洋商，必须交出凶犯，并登船擒拿，凶犯畏罪自刎。后是法国人打死中国民妇，凶犯被抓获、审实后，阮元根据中国法律，将凶犯绞决抵罪。但纠纷并未就此平息。

道光二年冬，英国护货兵船在伶仃山劫掠当地居民财物，双方发生争执，英兵开枪打死山民二人。阮元严令洋商，立即向在粤管理商

务的英国大班缚送凶手。大班诡称自己只管商贸，兵船另有他人分管，不能越权。阮元乃传谕于兵船之兵头。兵头谎称英兵也有多人重伤，理应两相抵销。阮元洞知其欺诈，再次要求大班交出凶手，否则封仓停止贸易，并将各洋行的茶叶、蚕丝等所有货物全部封存。大班态度强硬，声称无法抓获凶手，情愿停止贸易。而英国兵船则在外洋躲避，双方相持不下，僵持近一月之久。阮元拒绝让步，大班遂率领全部英人到黄埔大船上向阮元宣称：英人决定全体回国，不再做买卖。但是英国商船出口后并未回国，而是停泊在外洋的校椅湾，其兵船则先行离去。当时，南海番禺一带的商人等害怕事态扩大，或说关税恐怕将由此锐减；或说怕英人益加滋事省中。不少官员也顾虑重重。阮元依然不为所动，“以为国体为大，税事为轻，索凶理长，且该夷皆是诡诈，二十船有一、二千万银货买卖，并非真心回国，不可为其所欺胁。”^⑧至次年春正月，大班等果然前来请求阮元，希望准许英船入口回岸贸易，称兵船已远遁，无法捕获凶手，否则只得回国云云。又称，大班已火速将凶犯杀人之事禀告英王，下次英船来粤，若将罪犯缚来，再准入口回岸贸易，否则可以不准。经大班等再三请求，阮元始予应允，但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再来。如此，英国商船方得入口回黄埔，照旧例开仓通货。道光四、五年，有英国货船来粤称，阮元所追究的犯事兵船久久不敢回国，已不知逃往何国。直至道光六年，这种兵船都不敢再来粤洋。阮元在粤九年，“终元任，兵船不至。”^⑨阮元坚定地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当时，大规模的海战尚未发生，但阮元未雨绸缪，“严饬各炮台备弁督率兵丁，不动声色，暗加严备。”^⑩同时全力加强武备，以防不虞。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阮元到任伊始，“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炮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情形。”当时在省城东城的猎德建有炮台，作为防卫广州的要塞。但是，内港大黄埔有大河南通香山，东南通黄埔、虎门。潮涨时，水深可达十余丈至二十余丈，船只可由此直抵省城，而不必经由猎德。猎德炮台形同虚设，这是防务中的重大疏漏。仅有猎德炮台而无大黄埔炮台，不足以控制两路门户。阮元亲自观测地形，发现大黄山有小

石山一座，土名龟冈，四面皆水，是添筑炮台的理想之处。又大虎山系中路外洋进口要道，远处皆是浅沙，旧建横档、镇远炮台为第一层门户，若于大虎山脚再建炮台一座，作为第二层门户，即成重门之势，而后方又有猎德、大黄埔二炮台相呼应，则可形同金锁铁关。阮元又乘小船亲自测量水深，并饬司委员分别勘估，又征询于文武各员弁及附近士民，众论皆同。二十三日，阮元“奏建大黄埔、大虎山二炮台”。次年正月破土，四月竣工。炮台高一丈八尺，周长一百二十丈，内设兵房、药局等，置二千斤至七千斤之大炮三十门，射程在三百丈以上，从而大大加强了海疆的防务。建筑炮台之初，阮元曾说：“方今海宇澄平，无事于此。此台之建，聊复尔耳。然安知数十年后，不有惧此台而阴弭其计者；数百年后，不有过此台而自取其败者？”^⑪道光二年，英人退出广州，途径此炮台时，疑惧之甚，可见阮元之卓识。

对各要塞的兵员配置，阮元也细加调整。如校椅湾海口与水师提臣驻地相隔二十余里，仅藉镇远、南山炮台守兵，殊觉不足。前任督臣于炮台之后建兵房，并派督标及陆路提标兵丁二百名轮流驻守，每期半年。阮元认为，“督标及陆路提标系陆路兵丁，以陆防水，本不相习，且将弁各有操防事直，贴防他处，于本任营务未免旷废，而兵丁纷纷远调，亦未免稍形跋涉，兼费口粮。”遂与陆路提臣王兆梦、水师提臣李光显相商，决定改轮班派防为抽拨长驻：阖西地方安兵一百名，并添设巡洋桨船，仍隶中营管辖；大虎山炮台安兵八十名；焦门炮台原有三十名兵，现再添兵二十名，并添设巡洋桨船，后二处隶右营管辖。“营制一切并无更改，而要地有兵长驻，视从前暂时派拨，似为经久直捷。”^⑫可谓用心良苦。

西方殖民主义者还用鸦片换取我国白银，企图同时达到销蚀我国国力的目的。这一罪恶行径，引起国民强烈反对。阮元是在林则徐之前就坚决禁烟的朝廷命官之一。道光元年，洋船夹带鸦片入口，阮元断然采取措施，“查拏各处卖鸦片匪徒，拏获澳门总头叶恒树。复办理黄埔不许带烟之船入口，出具有烟惩罚入官结，洋商出具保结，摘去洋商伍敦元等三品顶戴，”同时奏请“严禁夷船鸦片，”“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⑬

阮元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大智大勇,坚韧不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尊严,申张了民族正气,其功绩将永垂史册。遗憾的是,这段历史鲜见介绍,因而人们知之甚少。

阮元是乾嘉学术领袖,一生黽勉于学术。他高扬务求其实、惟从其是的学术旗帜,代表了乾嘉学术的主流,对中国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阮元又是生活于从康乾盛世转向道光颓势时期的朝廷命官,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忧患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表现了清代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的经世思想,他无愧为乾嘉时期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①《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

②《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③《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顾亭林》。

⑤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

⑥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

⑦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引。

⑧《覃经室集自序》。

⑨《覃经室一集》卷五,《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

⑩《覃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⑪《覃经室一集》卷十一,《汉读考周礼六卷序》。

⑫《覃经室一集》卷十一,《诂经精舍策问》。

⑬《覃经室一集》卷十一,《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⑭《覃经室一集》卷十一,《焦里堂群经官室图序》。

⑮《覃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⑯《覃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⑰《覃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阮福案语。

⑱《覃经室三集》卷三,《商周铜器说上》。

⑲《覃经室三集》卷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序》。

⑳《覃经室三集》卷三,《金石十事记》。

㉑《覃经室三集》卷三,《山左金石志序》。

㉒《覃经室一集》卷十二,《浙江图考上》。

㉓杨光先:《不得已》。

㉔《覃经室三集》卷五,《里堂学算记序》。

㉕《畴人传序》。

㉖龚自珍《定庵续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㉗参阅拙作《从〈畴人传〉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阮元》,《学术月刊》,1998年,5期。

㉘《覃经室三集》卷五,《里堂学算记序》。

㉙龚自珍《定庵续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㉚《覃经室一集》卷五,《焦氏雕菰楼易学序》。

㉛《覃经室三集》卷五,《里堂学算记序》。

㉜《覃经室三集》卷二,《粮船量米捷法说》。

㉝《覃经室续二集》卷二,《陕州以东河流合勾股弦说》、《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

㉞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㉟《覃经室四集·诗卷七》,《过桃花岭》。

㊱《覃经室四集·诗卷八》。

㊲《清史列传》卷三十六,《阮元传》。

㊳《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

㊴《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

㊵《清史列传》卷三十六,《阮元传》。

㊶《覃经室二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

㊷《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㊸《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作者彭林: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5)